



陇东文化影响下的王符重民理念 ——以《潜夫论》为例

高 阳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 陇东地区作为周人早期活动核心区域, 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体恤民力、关切民生、重视农耕的地域文化传统。东汉后期思想家、文学家王符一生久居家乡陇东, 其重民理念深受当地地域文化浸染, 并系统呈现于《潜夫论》一书中。受陇东文化内在熏陶, 加之对东汉后期社会现状、尤其是边地民生实际的深刻体察, 王符形成了“民为国基”、反对苛政; 珍惜“日力”、鼓励生产; 实边治边, 人地相称的重民理念, 彰显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这种独特的重民理念不仅为后世崔寔等思想家所继承与发展, 更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民生理论的演进, 产生了深远且积极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 王符;《潜夫论》; 陇东文化; 重民理念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8日

中图分类号: I212

通讯作者: 高阳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Wang Fu's concept of valuing the peo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ongdong culture: taking "The Hidden Husband Theory" as an example

Gao Y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area of early activities of the Zhou people, the Longdong region has formed a reg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at sympathizes with the people, cares about their livelihoods, and values agriculture. Wang Fu, a philosopher and writer in the middle and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lived in his hometown of Longdong for a long time. His concept of valuing the peopl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local culture and systematically presented in his book "On the Hidden Husband".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of Longdong and with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especially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people in the border areas, Wang Fu formed the belief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opposed harsh governance; Cherish the power of the sun and encourage production; The concept of valuing the people by governing the border and matching the people with the land embodies a distinct regional cultural imprint. This unique concept of valuing the people was not on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by later thinkers such as Cui Shi, but also had a profound and positive historical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histor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heory.

Keywords: Wang Fu; The Hidden Husband Theory; Longdong culture; The concept of valuing the people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陇东文化指“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子午岭和六盘山为东西界,因在历史上相沿和传承的行政管辖关系,在文化上形成了诸多同质性和内聚力的地域性文化”^[1]。从思想史出发,地域文化的形成势必会出现产生伟大的作家与作品。如果将陇东地区的文化大致分为农耕、岐黄和民俗文化的话,那么将各个文化侧面进行连接的经典化文本便是东汉思想家王符的《潜夫论》。王符(85~163年),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著有《潜夫论》36篇,内容涉及政治、民生、教育多方面,“其指诋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2]。《潜夫论》不仅反映了东汉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图景,更展现了王符受时代影响和地域熏陶下的人文思想。对于《潜夫论》中作家表达的思想本身进行的研究,学界如王步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高新民《王符〈潜夫论〉释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一些期刊论文都有所涉及,但学者对王符的思想形成与地域背景之间的联系往往论述不多。“故乡的影响对于一位文学家来讲总是刻骨铭心的。”除青年时期赴洛阳游学外,王符一生中大多数时间是在家乡安定度过的,因此《潜夫论》一书中流露出的作家受地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广泛的思考,得益于陇东土地与陇东文化的塑造,集中在《潜夫论》中所表达的作家的重民理念上^[3]。

一、王符重民理念的孕育

“作家本人不是孤立的现象,他离不开其生活的时代和社会,也离不开他所接受的传统。”《后汉书》因王充、王符与仲长统三人的思想批判性之深将三人合传,而王符的重民理念有别于二者及同时期思想家的独特之处,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地域文化的浸染^[4]。

陇东地区是周人的早期活动区,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里深受先周文化影响,农耕传统悠久,喜好稼穡,重视农业生产,自古至今长期遗存着先周风俗旧习。王符的出生地今甘肃镇原,即陇东农耕文明的核心区。早在《山海经·海内经》中便有记载:“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书均,是始作牛耕。”周先祖不窋、鞠陶、公刘等数代人筚路蓝缕,在陇东地区积极发展农

业生产,中国的早期农耕文明在此生根发芽^[5]。“从不窋到古公亶父,先周部族的十二代首领与其族人生活在今庆阳一带,先周文化对庆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汉书·地理志》有载:“昔后稷封豳,公刘处豳,……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7]。”《后汉书》中描述王符“安定俗鄙庶孽”“独耿介不同于俗”,终身不仕的经历让他更近距离目睹过陇东底层百姓通过农业维系生计的生活状况,他的重民理念中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地域文化强调农本的观念影响。

自古至今,中国人对于身份划分的传统观念总是以“士农工商”为基,国家政策也多不离“重农抑商”之说,但在《务本》篇中,王符则指出: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穷^[8]。

农业是国家的治本之业,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浮侈之风在《潜夫论》的记载里,官吏贵族“衣服、饮食、车舆、庐舍、皆过王制”;地方豪族“一簠所费,破终身之本业”;连普通民众也竞相以财炫之,“奢衣服,侈饮食”,社会风气败坏严重。王符对这种社会现实表现得极为痛心,他希望通过理论将时人的普世价值与增强国力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民生的向好发展^[9]。

除了地域文化的熏陶,陇东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于王符重民理念中重视边域的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东汉时陇东地区属凉州下安定、北地郡治,毗邻少数民族羌人聚居地,在东汉中后期常受边夷侵扰,民众生活相较内地居民更为混乱困苦。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以先零羌为首的东羌各部叛乱,于永初二年十一月“称天子于北地”;永初五年(111年),《后汉书·西羌传》载“羌既转盛”,而朝廷采取的方式却是“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妄以边民内迁的政策缓解边疆局势^[10]90;永和六年(141年),依《后汉书·西羌传》载并、凉二州刺史“天性虐刻”,引发羌人二次暴动,“烧陇关,掠苑马”,结果“凉部震恐”,朝廷二次郡治内徙,“于是复徙安定据扶风,北地据冯翊^[10]。”朝中公卿“捐弃凉州,却保三辅”的提议遭到了王符的强烈批判,



“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如果把古代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王符认为边疆与内地的关系正如部位与躯体间的不可分割。即便在永建四年（129年）曾有过“九月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故土”的局势，但故土难回与战火弥漫依然让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抹朝不保夕、背井离乡的负面情感，这种生活实景对于曾亲身经历过内徙与回迁的王符而言，更加深了他在《潜夫论》中体现出来的异于旁人的重民理念的内涵，这也是王符思想的独特性之所在^[11]。

在封建王朝发展史上，中枢统治机构的权力分配比例总是通过一种君权不断扩大的趋势呈现出来的，所以在《潜夫论》中，王符通过列举先周统治者的事例来论证君主行为在民众生活中的作用，这样的方式是因为陇东地区在先周时期已经产生了清晰的君王重民、德政的文化基础。例如在谈及公刘时提到：

公刘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犹感德。（《潜夫论·德化》）

周先人以仁德感化万物以行事，“人君之治莫大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圣明的君主统治之下，百姓和顺，社会也安定和谐；王符还批评了一些昏君的失道之行，如对于“暴虐侈傲”的周厉王的评价：

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言是大风也，必将有隧；是贪民也，必将败其类。（《遏利》）

作为共王曾孙，周厉王在位时期暴虐无道，百姓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王符始终坚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对国家安定与民生和谐清晰的认知使王符在体察现实方面有着独特的个人理解，认为只有国安，后才能有更大程度的民安^[11]。陇东地区的文化与环境共同作用了王符重民理念的形成，无论是“周老王斩龙脉”的传说还是“公刘作庠斗，伊尹作桔槔，史佚作辘轳”的俗语，以及论述中对周先民事迹等周文化的纯熟了解与运用，都体现出陇东地域文化对王符思想的深刻影响，使王符以“潜夫”之身，在动荡的东汉中后期发出更为深刻的的呐喊。

二、王符重民理念的表现

陇东地域文化中爱惜人民、关切民生的思想，具体表现为《潜夫论》中以下几方面：

（一）“民为国基”，反对苛政

人口是国家存在的基础，王符认为民众生活水平的高低和帝王的统治道德存在密切的联系，“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汉儒之“天人合一”观强调统治者需仁政爱民，实现国家的安定富强。王符借古喻今，目的是为了匡时救世。

东汉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地显露了出来。“富者阡陌连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君王无为，外戚宦官接连专权，国家体系混乱不堪；边备空虚，蛮夷犯境频繁，东汉政权在当时已然体现出摇摇欲坠的情势，这种场面被王符为代表的一部分具有社会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察觉，并给予了结合了个人经历为主的理论建议。

王符强调“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只有“政通”才能实现“人和”，在皇权时代，掌握最高统治权力的个体——皇帝，其个人的执政品格，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国家百姓的生活。“天之立君，……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故君主应以“以四海为一家，以兆民为通计”，唯有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帝王，才能够海内凝一，理乱治强，实现国家的中兴。

“人君之称，莫大于明；人臣之誉，莫美于忠”，这是王符理想中的君臣标准，即以民为本。王符以陇东地方文化中重民、贵忠，讲义的天下观为例，在《潜夫论》中不断引用公刘、文王等明君典范，劝诫时政，同时以厉幽故事证明“昔日为我哺乳其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的现实逻辑，直指惟有君王体恤民生，百姓爱戴君主，国民一体，才能更好扭转国家不利现状。陇东土地既是王符生活成长之地，又是他归隐撰书之处，这片土地上经历的灾难与其文化内涵中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塑造了王符独特的气质禀赋，他一面遵从着孟子“民贵君轻”的儒学思想，另一面又能够凭借个人的文化修养与生活阅历进一步提出“民为国基”的现实理念，这与陇东地区人口分布和农牧交错的地理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界中，这样的论述也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二）爱惜“日力”，鼓励生产

为了实现“利民”“恤民”的主张，王符在《潜夫论》中大力呼吁“爱惜日力”。“爱日”即爱惜百姓的劳动时间。早自先秦《吕氏春秋·上农》篇中就有载“敬时爱日”的说法。长期生活在农耕文化兴盛的陇东地区，王符对于百姓农作表现出极大的关切，认为民众有效劳动时间的长短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温饱，进而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有日也。”百姓生活的富足，最基本的就是保证他们的本业，即农业生产时间的充足：人民无日，就没有足够的生存资料维系生活，导致人口不断减少，国家发生混乱。“富足生于闲暇，贫穷起于无日”，为什么会出现百姓“无日”的情况，王符强调国家的稳定否与民众劳动时长有着很大的关系：

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则民安静而力有余，故视日长也。……乃君不明则百官乱而奸鬻兴，法令而役赋繁，故视日短也。（《爱日》）

国家稳定太平，百姓就具有充裕劳作时间进行农耕活动；若是政局动荡不安，“多害而役剧”，不仅家庭劳力缺失，劳动时长也会受到巨大的损害，所以应当“务省役而为民爱日”。

诉讼繁多，枉法扰民，在王符看来也是影响人民劳作的重要因素之一^[12]。农业生产过程中对于“无讼”理想的追求自先秦便已出现，如《韩非子·解老》篇就提到：“狱讼繁则田荒”，《潜夫论》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

从事督邮，有典之司，民废农桑而守之，辞讼告诉，及以官事应对吏者，一人之，日废十万人。……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口受其饥也。（《爱日》）

民众若逢讼案，司法过程中往往一家一户之事动辄牵扯邻人乡里，邻里皆忙于应对官司，无法积极投身农作，农业废弛，致使每年数百万人口陷入饥寒境地。王符强调“吏爱官而不贪，民安静而强力”，只有让农民保持足够的农业生产时间，才能使得国家富强。

农业生产不同于百工之巧艺，前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因此王符还强调农业劳动应顺应物候时令之变化，顺时耕作。《荀子·王制》篇提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说明在传统农业观念之中对于“应时”的关注，王符关于顺时农作的思想着重表现在《务本》篇中：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聚于野，此富国之本也。

关于顺时农作，王符指出国家需要把农业生产的时令交还给百姓，百姓积极农作，才能够有所收获^[13]。陇东大地上有许多关于时令的农谚，例如“早上惊了蛰，晌午拿犁别”“秋分糜子寒露谷，一过霜降拔萝卜”等等，都表现了这片原野上的人民对于农业繁荣的淳朴期望，说明了遵循时令在农耕过程中的意义。宁县春荣乡出土的骨镰化石，环县曲子出土的土铜斧，陇东地区的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片土地上孕育的农耕文化延续之久，王符深受这种注重农业生产、珍视土地劳作的文化影响，因此在《潜夫论》中以天地之大道，论小民之生存，显现了他贴近底层人民，关心民生疾苦的一面，和以百姓之心为心，求国家兴盛的美好祈愿。

（三）治理边疆，人地相称

《后汉书》载王符与马融、张衡、崔瑗等人友善，这些饱学之士都或多或少在体察到东汉社会问题时阐发过针砭时弊的言论，但王符因出生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对边疆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因此面对东汉边患尤其是汉羌战争，统治阶层采用边民内迁之策苟且求安的错误现象时，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传统的儒家士子对于边疆治理的关注度并不很高，孔子面对“居九夷”的情况，仅以“君子之居，何陋之有”的道德层面进行回应；随后的孟子则更提出“无边”思想，认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只要君主施行仁政，自有“天下顺之”。但随着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对于中原王朝的觊觎，土地资源导致的流血事件屡见不鲜，在民族冲突显现得极为明显的陇东地区，王符目睹了民众因边患遭受的无尽苦难，他的治边思想正是对“无边”与“弃边”论者的反驳。



“《书》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于子也，岂可坐视其为寇贼之所屠剥”，朝廷对于边患采取的消极政策置百姓性命于不顾，从根本上是对于民本思想的违背。“圣王之政，普覆兼爱，不私近密，不忽疏远”王符认为无论是边地还是内地百姓，统治者都应以平等兼爱的态度对待，不能有亲疏之分。“扁鹊之治病也，审闭结而通郁滞，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故病愈而名显。”王符在强调边疆及边民治理问题重要性的基础上，结合他陇东地区的实际生活经验，在《潜夫论》中提出了“移民实边”的安边之策。

秦汉时期的实边手段大致有流放罪犯、强制迁徙与开垦屯田三种，但这些实边实践在后续过程中都收效甚微，因此王符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边手段：通过惠民政策使民众自发前往边疆地区。以举孝廉政策为例，如果内郡人妻子共同移边，五年之后则与居民同，均得选举；在商业行为方面则“运民耕边入谷者”，“使食倍贾于内郡”^[14]。这种利诱的行为虽不符合传统的儒家观念，但实际上更体现出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正所谓“均若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如此则可实现“虽欲令无往，弗能止也”。纵观东汉后期具有社会批判思想的思想家群体，王符重民理念中的治边思想极具现实针对性，这种表现与陇东地域文化的熏陶关系密切。从先周开始这一地区便多处于边疆地区的农牧交错带上，而毕生居住于陇东地区，经历了安、顺时期的“羌乱”，亲眼目睹边地空虚，萧条不堪现状的王符，更加能从切身的角度，在地域文化特征的思想的影响下去提出针对又实际的解决办法，后天文化的学习许有高下之分，但是先天地域的熏陶会对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环境经历，才让王符对民众的苦难更为清醒而深刻。

三、王符重民理念的影响

一方面，对于“重民理念”进行溯源，可以看出王符继承与发展了自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从西周开始的“敬天保民”至春秋时的“民为神本”，到战国时的“民为君本”，再到西汉贾谊提出“多元民本论”，最终形成了东汉后期的王符明确提出的“民为国基”；另一方面，王符的重民理念在紧随其后的崔寔《四民月令》，仲长统《昌言》中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东汉后期社会批判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5]。

崔寔之父崔瑗同王符“友善”，因此可以进行合理推断崔寔较早地接触过王符与其《潜夫论》的重民理念，这在崔寔《四民月令》中可以体现一二。崔寔死后仅十四年便爆发了黄巾之乱，实际上已是汉王朝崩溃前夕。崔寔之作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动荡，主张抑制徭役，鼓励生产，主观上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客观上仍维护了民众的生活安稳。

《潜夫论笺》中引崔寔《政论》二十六则，可以体现出二人思想的共同性与前后联系。崔寔继承了王符“民为国基”的观点，进一步强调“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16]。《四民月令》的“四民”之称指的是传统社会身份中的“士农工商”四种，包含着多种经营活动，但归根到底仍是围绕农事作安排的，所以历来将其归为农书一类。崔寔认为农业是百业的主体，同时他提倡的工商业中也忽视了“雕镂”“刺绣文”等骄奢巧逸之艺，说明崔寔受到了王符所提出的灵活化的本末观念，因此反对“列肆卖侈功，商贾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提倡务本的工商业而非浮侈的工商业。崔寔重视生产，一切以发展生产为重，他担任五原太守时，同样鼓励人们耕种纺织促进生产，护佑百姓生活。五原即今内蒙古境内，时常受到鲜卑檀石槐部侵犯，崔寔亲眼目睹百姓之苦，因此对于王符民本思想的接受更加深入，提出“‘飢’满天下，可不懼哉”，他形容当时的阶级矛盾是“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如果统治阶级一味“割脰以肥头”，不重视民生福祉，就会对国家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17]。崔寔社会批判思想中关乎民生的观点，是对王符重民理念的继承与深化，因此崔寔也成为了继王符之后的批判思想家的典型代表之一。

四、结语

王符的重民理念以“潜夫”议政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对于东汉，更是在后世每当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便有一部分具有开明思想的知识分子秉持这种传统去关心民生疾苦。唐末隐士有《无能子》上中下三卷；宋元之交有邓牧著《伯牙琴》；明清更迭亦有唐甄撰《潜书》上下篇，即



便时代不同,情况各异,但作品中对于百姓生活苦难的同情却一脉相承,王符《潜夫论》首开其端,其后诸家可谓扬其绪。

“夫子挑水润柏王,宁愿渴死不敢尝^[18]。”王符终身未仕,与仕途通达的文人相较,他的思想,尤其是接触更多社会底层民众苦难而产生的重民理念,有着非常客观真实的观点,而非刻意穿凿之论。清代刘熙载《艺概》称之曰:“《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1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20]。在陇东文化影响下的王符的重民理念,不仅对东汉思想界产生了独特的影响,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民生理论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 [1] 许尔忠,刘治立.陇东文化研究归述[J].人民论坛,2014,(29):178-180.
- [2] 晋]范晔.后汉书(六)[M].中华书局,1965:1630.
- [3] 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M].商务印书馆,2013:22.
- [4] 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科学[M].中华书局,2005:7.
- [5] 袁珂.山海经校注[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393.
- [6] 马啸,刘治立,曲涛编著.庆阳文化史[M].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60.
- [7]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下[M].中华书局,1962:1642.
- [8] 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 高新民.东汉思潮与王符思想[J].兰州大学学报,2001,(06):73-79.
- [10] 曹崇岩.东汉北地郡治内徙考略[J].沈阳大学学报,2009,21(06):90-92.
- [11] 单敏捷.关于东汉北地郡内徙问题的再讨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30(02):182-190+217.
- [12] 王步贵.王符人性思想发微[J].兰州学刊,1989,(02):26-31.
- [13] 李学勇.试论民本思想在王符思想体系中的地位[J].甘肃社会科学,1994,(03):37-40.
- [14]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M].中华书局,2013:195.
- [15] 赵玉龙.论陇东农耕文化对王符农本思想的影响[J].地方文化研究,2018,(04):102-112.
- [16] 孙晓春.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观念转型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223.
- [17] 汉]崔寔著,缪启愉辑释,万国鼎审订.四民月令辑释[M].农业出版社,1981.
- [18] 赵宝玺主编.镇原史话[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172.
- [19] 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6.
- [20]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2350.

作者简介:高阳(2002-),男,汉族,甘肃镇原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